

# 翻译的语用等效探究

徐品晶

(福建工程学院 外语系,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翻译的核心价值是等效与达意, 它没有绝对对等, 只有最佳关联。翻译的语用学视角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语用翻译站在沟通源语与译语两种文化的立场上, 根据原文语境, 准确理解原作内容, 从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社会习俗等因素出发, 提倡对原文进行重新提炼, 运用替换、简化、改写或者零译等手段, 以最佳的语言选择策略, 力求与原文相对应的语用效果。

[关键词] 翻译; 最佳关联; 手段; 语用效果

[中图分类号] H 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13) 04-93-05

## 一、引言

翻译研究之所以会出现“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 是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不同语言形式之间进行语码转换的活动, 更重要的是, 它是在一个复杂的语言、哲学、文化、心理、审美等方面进行适应、选择以及再创作的过程。因为对翻译的本质认识不同, 许多论者从不同的途径切入翻译研究, 提出了纷呈各异的研究范式与研究视角, 如翻译生态学、和合翻译学、社会翻译学、目的论翻译观等。从关注文本自身至文本外的跨学科文化环境, 各类研究范式与视角相互杂合、相互渗透, 为翻译的可持续研究带来了许多重要的启示。

当然, 理论必须回归到实践才能证明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在对“翻译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尝试性探索中, 翻译的语用学视角越来越受到广泛的重视, 语用翻译的核心是等效翻译。该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由著名翻译理论家Nida提出以来, 在翻译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此后, 许多学者就“等效理论”做出了不同的阐释及理论延伸, 如, Kade提出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着一对一、一对多、一对部分和零对等四种不同的对等形式; Koller把对等分为外延

对等、内涵对等、语篇规范对等、形式对等、语用对等五个层面; 何自然则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 从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两个范畴力求翻译中的语用语言等效, 注意传达原著的“语用用意”。<sup>[1]</sup>总之,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理解与误解相伴而生, 我们平时所做的翻译是否“忠实”“适宜”“等效”, 都要遵循一种等效原则: 根据原文语境, 从读者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社会习俗等因素出发, 准确理解原作内容, 力求与原作相对应的语用效果。换言之, 语用翻译提倡按需处理译文,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不只是对原作采取直译, 而是解读原作全部内容, 重新提炼, 以求给出一个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sup>[2]</sup>本文以语用学相关理论为基础, 考察对原作进行替换、简化、改写或者零译等翻译手段所达到的语用等效作用。

## 二、关联与替换

在翻译活动中, 没有绝对对等, 只有最佳关联。D. Sperber和D. Wilson的关联理论 (Relevance Theory) 把语言交际活动视为一个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 这种活动涉及两种意图: 信息意图 (informative intention) 和交际意图 (communicative intention)。人类交际依赖于两个

关联原则的互动:(1)关联的认知原则。生活在同一世界中的人们并非享有毫无二致的世界认识,一方面,从宏观上看,物质世界具有普遍性,但个体的人们在各自所处的直接环境却有着特殊性;另一方面,人类的思维与心理活动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但其拥有的认知能力却有所差异,所以,人们在彼此交流信息时,或多或少地呈现出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的差异。而这种“认知环境”在关联理论中被定义为心理上“可以显映(即感知与推理)”的事实或假设的集合。(2)关联的交际原则,当交际双方的认知环境显映相同的事实或假设时,在他们之间便产生认知环境的重叠,即“互为显映”。每一个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而值得注意的是,交际只期待产生一个最佳关联。<sup>[3]</sup>

Gutt (1991) 把关联理论的核心观点应用于翻译研究,他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即接收语语段的译文应该同原文在释意上具有相似性。译者的责任是力求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当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交际线索和语义表征释义相似时,适用“直接翻译”;而当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只是在功能方面,而非在交际线索和语义表征方面描述相似时,宜采用“间接替换”。<sup>[4]</sup>如,现在许多城市都建有“步行街”,其信息意图是建设一条只允许行人步行通过而机动车无法通过或不宜通过的街道。“步行街”似可直译为“a walking street”,因为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在交际线索和语义表征释义上有相似的一面。但是,经过进一步推理可知,“a walking street”是指路宽可走机动车,但规定禁止机动车通行,只准步行的街道。显然地,“a walking street”与“步行街”不是最佳关联,无法体现“互为显映”的认知重叠,译者的努力与读者的期盼不相吻合。而如果从功能等效视角来分析,汉语中的“步行街”实为“行人街”,而英语中也恰好有“pedestrian street”与之语义相一致。把“步行街”译为“pedestrian street”不仅不拘泥于原文表达方式,也更符合英语语言规范,传达了原文韵味,达到了最佳关联。

关联理论认为,每个个体对物质世界的主题

认知结构都是由词汇、逻辑与百科知识三部分组成,进而形成主体的认知环境。由于各主体的知识结构不同,推理的结果也不尽然相同。东西方民族思维模式的巨大差异导致两种语言的表达千差万别,要在双语之间进行成功替换,译者需对源语文本进行全面的分析,然后根据译语思维对原文进行认知重组,继而进行译语替换,找到最佳关联。十二生肖是中国最具特色的文化元素之一,找到准确的译名,传达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以便向世界宣传中华文化,这无疑是全体译者的责任,但目前关于十二生肖的某些译名颇具贬义,如“鸡”被译为“cock”(与“性器官”关联),“牛”被译为“bull”(与“脾气暴躁,争强好斗”关联)。而事实上,中国的生肖都隐含正面、积极的意义,生肖中的“鸡”往往让人联想到“雄鸡报晓”、“闻鸡起舞”等;生肖中的“牛”更多的是指牛的那种终日耕作、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形象。美国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对十二生肖翻译为:Rat, Ox, Rabbit, Dragon, Snake, Horse, Sheep, Monkey, Rooster, Dog and Boar,笔者认为值得肯定,它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与内涵,同时,也采用了中性的词汇来翻译“鼠”“鸡”和“猪”等,避免了中外观念上的冲突。

### 三、顺应与改写

维索尔伦(Verschuieren)的语言顺应理论把语言的使用过程看作是一个不断地进行语言选择与顺应的过程。人们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做出各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备三个特性:变异性(variability)——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negotiability)——所有的语言选择都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绝非机械地,或严格地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顺应性(adaptability)——语言使用者能够从可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需要。<sup>[5]</sup>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怎样才能有意识地选择译文语言和翻译策略,认知、推理出与作者的交际意图相匹配的最佳关联,使他的译文话语产生最佳的语境效果,就必须根据原文的性质和特征,做出相应的策略调整,如,

简化与改写。

### (一) 简化

简化不是故意漏译,也不是省译。翻译的任务,是既要传递出源语的信息,又要向异域传播文化,任何会造成源语信息流失或文化缺省现象的翻译都是译者应该竭力避免的。简化是让译文更贴近更易懂的过程,达到忠实传神的效果。<sup>[6]</sup>但简化法的应用要建立在译者准确理解原作者意图和源语文化内涵的基础之上。如:

原文:“老师是桃花沟的李白、齐白石、钱钟书;老师是桃花沟的杨振宁、钱学森、华罗庚;老师是桃花沟的陶行知、马卡连柯……”

译文: In the eyes of the villagers, he (the teacher) was no less than a great man of letters, a great artist, a great scientist as well as a great educator.

通过对比发现,原文作者所列举的多位具体人名被简化并译为四类人,即文人、艺术家、科学家和教育家。这些名家对具备源语文化背景的人来说耳熟能详,而对于译文读者来说就不一定了解,如果要具体地把名字翻译出来,必须要作相关的引注,势必造成冗长。而原作的意图无非就是想传达该老师在山民心中是一位不简单的智者和大师,所以,译者作了这样的简化,因为在翻译中,能传达原作的意思或意图的译作就能代表原作。<sup>[7]</sup>

因此,简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不拘泥于原文风格和形式的翻译方法,使用这种译法能够消除源语和译语之间存在的巨大文化差异,取而代之的译文不仅简洁,而且易于被读者理解。

### (二) 改写

改写的目的是将原文名称中的精髓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等效译出,取得异曲同工的效果。改写的前提条件必须要正确认知原文作者意图,顺应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文化习惯,根据个体的主题认知结构,最大限度地呈现出原文所要传达的文化含义和形象。如,译者前辈严复先生把亚当·斯密的“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译为《原富》,体现了他超凡的语言驾驭能力和翻译技巧,因为“原”字表示“源头”“溯源”“探究”之意,与书名的英文单词

“Inquiry”“Nature”和“Causes”都有相通之处,可谓言简意赅。同样地,他也把赫胥黎的“Evolution, Ethics and Others”(进化、道德及其他)译为《天演论》,化繁为简,字字珠玑,可见当年他为立一名而旬月踟蹰的形象。

语用翻译提倡译“意”,即体现原文作者的语用意图。简化与改写都是语用翻译常用的技巧,但在翻译过程中,它们必须统筹原文、译文和译文对象(指读者、译文使用者)三方面的相互配合,即译事的三元关系:<sup>[8]</sup>(1)简化或改写能否反映出原文内容;(2)译文对象对简化或改写内容能否理解;(3)译文能否反映译文的目的、能否实现译者的某种意图,从而取得译文的经济和(或)社会效益等。因此,简化或改写是一种比直译或替换要深刻得多的翻译行为。如,电影片名虽然只有片言只语,却往往是吸引观众、影响票房的点睛之笔。曾经火爆一时的好莱坞大片“Catch Me If You Can”在中国却遭遇票房惨败,究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其在大陆的译名为《我知道你是谁》。作为一部主要讲述FBI捉拿通缉犯的悬念迭出的侦探片,其译名如此平淡、拗口,何以先声夺人、引人入胜?因也理所当然地影响了票房。而比较其在港台等地的译名,如《逍遥法外》、《智抓双雄》、《神鬼交锋》等,则点出了影片的玄机,吸引眼球,达到争睹为快的效果。<sup>[9]</sup>所以,要想让观众对片名过目不忘,历久弥新,必要时可以根据电影内容将它改头换面,以更好地适应本土市场。如,从广告宣传功能的角度出发,把“The Italian Job”根据剧情译为《偷天换日》;把“Saving Private Ryan”译为《雷霆救兵》,把“Sister Act”译为《修女也疯狂》、“Earthquake”译为《夺命惊魂》,“The Lord of the Rings”译为《魔戒》;从美学欣赏的角度出发,把毫无感情倾向的片名译得语境优美、含蓄传情,把“Rebecca”译为《蝴蝶梦》,把“Pretty Women”译为《风月俏佳人》、把“Guess Who”译为《男生女生黑白配》等;从文化重构角度出发,把“Spider”译为《蜘蛛侠》(“侠”字增添了一份中国的侠士义气,传形又传神)、把“Ant Z”译为《蚂哥正传》(片名借用鲁迅的《阿Q正传》点出电影题材,引起观众联想)、把“Waterloo Bridge”译为

《魂断蓝桥》(源于汉语典故——尾生抱柱,讲述一个名为尾生的小伙子与心爱的姑娘相约在蓝桥下见面,可姑娘迟迟不来,尾生左等右盼,尽管水涨桥面却仍紧紧抱住桥柱不肯离去,直至被湍急的流水冲溺而亡。后人就把情侣一方失约、一方为之殉情称作“魂断蓝桥”)、把“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ry”译为《廊桥遗梦》(“廊桥”为有顶的桥,工艺精美,古朴大方,较多分布在我国江浙、福建一带,有山水映衬,许多电影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以廊桥为背景)。

#### 四、言外之力与零译

20世纪50年代,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 L. Austin, 1911-1960)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语言不仅是对客观世界进行描述的工具,而且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即言语行为。他从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中抽象出三种行为,分别称为“说话行为”(locutionary act)、“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通俗地说,说话行为指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施事行为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取效行为指说话行为或施事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某种效果。<sup>[10]</sup>翻译活动既是一种跨语言间的语码转换,还是将一种语言中的非语言交际符号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活动,因此,翻译也是一种人类行为,而任何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在探讨哪一种译法更为理想时,主要看译文是否达到了翻译的目的。

零译也即音译,它有两层含义:(1)对原文中的词语故意不译;(2)不用目的语中现成的词语译出源语中的词语,以期产生“陌生化”的效果。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常常会涉及富含民族特色文化的词语,这些词语形式在特定语境中所使用的意义往往与通常所熟知的意义不同,译者不必刻意把这样的词语做“归化”或“异化”处理,而应通过某些特殊的语言策略以引起译文读者的注意,从而花更多心思去考量使用该语言形式背后的意义,达到言后成事效果。<sup>[11]</sup>如,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有这么一句:“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sup>[12]</sup>其中“不折腾”一词的丰富涵义引起了代表们的共鸣。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口译员直接以“bu zheteng”音译,未辅以解释性翻译;一个月之后的《人民日报》英文版标题和正文又分别译为“bu zheteng”和“don't zheteng”。<sup>[13]</sup>根据福勒(Fowler)的观点,“不折腾”这种跨语域使用就可视为有含糊其意的言外之力兼具“陌生化”的取效行为效果。<sup>[14]</sup>又如,北京2008奥运吉祥物“福娃”的最初英译为“friendlies”,这种“貌合神离”的译名弄得读者一头雾水,引来了广泛的争议,原因不外乎是把鲜活的民族词汇洋化,生搬硬套地使用现有的英文词汇,既难以体现中国特色,更难以起到弘扬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行为效果。而事实上,我国主流媒体在用英文对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揭晓这一新闻进行报道时已采用过Fuwa的称呼。<sup>[15]</sup>作为北京2008奥运会的吉祥物,Fuwa具有专一性和独一无二性,虽然一开始可能不为外国人所了解和熟悉,但事后证明,Fuwa很快为人们所接受,并深入人心,人们在Fuwa与北京奥运会之间产生联想,主办国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文化气息得到弘扬和传播。

#### 五、结 语

如何从语用学的角度去考察原文与译文的高效对等是翻译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议题。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对源语的解读“译无定法”,只要译文能传达原作的用意,实现跨语域的交际目的,就是一种可行的译法。当然,作为语用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既要考虑潜在的译语读者,也要充分了解源语文化,努力做到思想信息的有效“移植”与等效。语用翻译站在沟通源语与译语两种文化的立场上,应避免单纯的“归化”和“异化”两种方法,必须结合文化自我,从一个整体性、全球性的高度去审视和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sup>[16]</sup>在对待源文化与译语文化的态度上,既不能过分尊重源语文化,忽视译语读者的现实需求,也不能对源语文化尊重不足,把源语文化与特征全部抹杀殆尽,而是在两个极端中寻

求最佳关联, 以最佳的语言选择策略, 达到以言喻事、以言行事及以言成事的最佳语用效果。

#### [参考文献]

- [1] 李占喜. 译文读者为中心的认知和谐原则 [J]. 外语教学, 2012 (1): 101-104.
- [2] 何自然, 李捷. 翻译还是重命名 [J]. 中国翻译, 2012 (1): 105-108.
- [3] 张亚菲. 关联理论述评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2 (3): 27-30.
- [4] GUTT E 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1: 27-31.
- [5]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 Ltd., 1999: 59-61.
- [6] 李正栓, 贾晓英. 归化也能高效地传递文化 [J]. 中国翻译, 2011 (4): 51-53.
- [7] 屠国元, 李文竞. 翻译发生的意向性解释 [J]. 外语教学, 2012 (1): 99-102.
- [8] 何自然. 语用学探索 [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0: 221-241.
- [9] 郑玉琪, 王晓冬. 小议电影片名的英汉翻译原则 [J]. 中国翻译, 2006 (2): 68-70.
- [10] 顾曰国.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诠释与批判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9 (1): 30-39.
- [11] FOWLER, ROGER. Linguistic Criticism [M]. 2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58-71.
- [12] 胡锦涛.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DB/OL]. (2008-12-18) [2013-01-02].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
- [13] Hu Jintao's bu zheteng baffles foreign media: ... As long as we don't waiver, don't slack off and don't "zheteng", and as long as we firmly push forward reform and opening ... [N]. People's Daily, 2009-01-08.
- [14] 朱纯深, 张俊峰. “不折腾”的不翻译、零翻译、陌生化与话语解释权 [J]. 中国翻译, 2011 (1): 68-72.
- [15] Beijing Finally Unveils its Olympic Mascots —Five Fuwa [DB/OL]. (2005-11-11) [2013-01-02]. [http://www.Chiandaily.com.cn/english/doc/2005-11/11/Conteat\\_493977.htm](http://www.Chiandaily.com.cn/english/doc/2005-11/11/Conteat_493977.htm).
- [16] 刘国兵. 翻译生态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J]. 外语教学, 2011 (3): 101-104.

##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Pragmatic Translation

XU Pin-j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value of translation is effectiveness and to the point. There is no absolute equivalence but optimized relevance. Pragmatic translation, which attracts more and more concerns, stands between the cultures of target languages and the translated ones, emphasizes 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writings,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readers' cultural background, concept of values and social conventions, and refines them by means of replacement, simplification, rectification and zero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equivalent pragmatic effectiveness of the original writings.

**Key words:** translation; optimized relevance; means; pragmatic effectiveness

(责任编辑 陈蒙腰)